越是临近当下的时代，有关的资料即愈丰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撰写二十世纪的思想史着实不易。彼得·沃森的写作大体上没有区分不同方向、领域，分门别类，而是在每章在一个笼统的主题之下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叙。好处是能够体现二十世纪各学科、研究领域之间互相的影响，如何围绕着一个近似的话题多种思想一同迸发的过程；坏处也很明显，不仅考验着作者的概括能力、博览程度，也给读者的查找、回顾带来了困难，尤其加上作者并未编辑事件年表或人名索引等形式的附录。倒不是说二十世纪的人类在所有的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但已经创造的成果或自以为的成果仍数不胜数、浩如烟海，作者未能在自己所划定的领域足够完整地将各各方面都纳入分析的视野之中亦不足为怪（如茨威格、杨振宁、摇滚乐、克罗齐、鲍勃·迪伦等都未被探讨或提及）。在跨越如此多相差极大的领域之际，作者的分析也无法面面俱到，全然无误。

形上学虽自亚里士多德起便频遭非议与批判，无可否认的是，哲学的要害即在于形上学，以至于诸多的批评者虽打着批判一切形上学的名义，不过是到头来还要推销自己的形上学。形上学从未曾达成其最初诞生时的目的，哲学家们在一次又一次构建完备哲学体系的尝试中屡屡碰壁，仅有的收获是从多个角度发现了人所固有的、未能被超越的局限。而二十世纪的思想界，连这样“徒劳”的尝试也难觅踪影。西方哲学中，形上学实际上已然消亡，至少是陷入了看不见希望的停滞。分析哲学和“大陆派”的哲学家们在自掘形上学的坟墓，更不要说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对一切宏大概念的排斥与消解。作为物理学家的斯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的感慨恰如其分“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如若说中世纪时期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那么在二十世纪哲学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只是主人变成了科学。

正像作者所注意到的，二十世纪非西方文化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与“现代性”寻求妥协，学习如何回应西方的方法或西方的思维模式。类似的，在整个思想史方面，大多数领域也主要是在回应科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与随之而来的各项产品是二十世纪乃至近现代人类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主要原因。而二十世纪科学的成就尤其令人惊叹和欣喜，但一枝独秀无疑也蕴藏了深层次的危机。文艺复兴以来，人文学科（主要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到了二十世纪之时，这种跨领域间的沟通几乎变成了单向的，哲学家们在费力地理解、探明新的科学发现的意义所在，归纳科学之所以如此成功所具备的特征并试图以此指导其他学科，但再也没有康德时代那样哲学家的思想极大的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情形。是科学已经足够独立，足够强大了吗，亦不尽然。说到底，所谓不同的学科无非代表了人类从不同的方向对宇宙、自身奥秘的追寻，哲学家们在探索之时撞上了墙壁，发现了理性的有限性。但不要忘记，理性也正是科学的根基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无非是走得更快一些，先于科学到达了自我的边界。没有相应的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支持，科学究竟还能走多远令人担忧。相关的质疑、反思与愈加明显的颓势在二十世纪的末叶浮现。一种对未来悲观却可能的预测，若是人类无法做出突破，纵然人类能在科学技术上再创新的奇迹（如超人工智能），人类文明只是危在旦夕。

二十世纪另一思想的失败也颇具代表与启发性。从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史的弗洛伊德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艺术等）自诞生起一直遭受不同学者的批评，但始终屹立不倒（其实至今也如此），最后终于被证明在许多方面弗洛伊德的学说犯了基本性的致命错误，原原本本的弗洛伊德主义已经无法再被称之为科学。讽刺又意味深长的是，纵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被现代学界修正的部分远甚于被继承的，但心理学界直到如今，仍没有哪一个，可算得上是具有匹敌弗洛伊德的影响力的后来者，再能构造出另一套与弗洛伊德的体系同样深刻但更符合事实的学说，以至于在一般大众甚至部分学者的心目当中，弗洛伊德依然是正确而严谨的。这或许会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反宏叙事的一大功绩与例证，但这也彰显着，人们对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思想体系的渴望，与人的能力是多么有限。

二十世纪思想史上唯一的主角是西方文化，这是自古典希腊、罗马以来一脉相承的发展的结果。作者为非西方世界话语的缺失表达了遗憾，而也许，正是现代性独由西方文明支撑所带来的单薄性，造就了如今现代的人类文明相当一部分的问题。纵观寰球，只有一个地区的文化具备与西方相抗衡的传承性、独创性，但她如今深陷囹圄，无暇自顾（确实如此）。二十世纪只剩下了历史，真不知二十一世纪将会如何？